

政学商领袖汇聚第三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2015 年 1 月 10 日，福建福州 NESC 会场，早已到场的媒体记者们凝神守候在入口处，每位步入会场的人都可能引起轰动与追逐。

第三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此间举行，这也是峰会首次移师福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知名财经学者、企业家等诸多政学商三届领袖悉数露面，纵论“涅槃：适应新常态凝聚新共识”。

福州乃至整个福建都极少举办如此高规格的经济学术论坛。媒体对此解读为，本届峰会是“新常态”概念提出后鲜有的高端经济论坛之一，也是福建自贸试验区获批后首次汇聚如此规模的“智库”为自贸区及福建经济把脉，显得尤为可期。一场为期两天的经济思想盛宴，拉开大幕。

创新是世界经济繁荣的途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指出，经济繁荣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

新常态无疑将是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最热的词汇，就如何应对新常态，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在进行思想碰撞的同时不约而同给出了答案：创新。

费尔普斯在演讲中说，美国劳动生产力下降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美国近几十年来整体创新能力下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不再愿意去冒险；既得利益者担心创新创造会破坏现有格局和他们的利益。

费尔普斯说，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目前的新常态都不一样，找到相应的方式推动本土的创新，才能够实现大繁荣以及持续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和政策。

相较于研究型学者，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的话显得更加值得重视。李毅中列举大量的详实数据，解读中国工业所面临的新常态、并开出了药方：企业寻求创新，国家加快改革垄断行业。

中国创新到底怎么样？

董浩林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为何创新不足”一直是个很有热度的话题，这个讨论的前提在于大家对中国创新不足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然而最近风开始转向，在一些国际机构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大幅提高。日前学者朱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题为《中国创新不足吗？》一文中，也基于中国最近几十年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创新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在与向最好的“发达国家”接近。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可近几十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但果真如朱教授所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创新型经济迅速转型”吗？

为了让这个讨论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把“创新”定义为“科学和技术创新”；其二，采用什么水准和质量的标准来比较。例如钱学森之间“为什么解放后的中国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他把创新水准定位在民国大师级别及其这些大师所创造的科技成果，而不是用SCI论文和专利授权来衡量；其三，与谁比较，人们可以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选择一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比较，而比较国家的选择指标也可以很多，例如像人均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也可以采用文化、制度、人口等指标。

正因为评判的选择如此之多，关于中国创新是已经转型为“创新型经济”，或者创新仍然“不足”，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选择指标之前，首先需要明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出与优胜者的差距而进步、还是与落后者比较让国人感觉良好，或是在回答“为什么”之前，做一个较全面的比较从而了解中国在人类创新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避免陷阱、找到前进的方向？显然，最后一种选择最为理性和全面，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很多专门研究科技创新的学者逐步把这个宏大的图画拼凑起来。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刘涛雄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新常态无疑将是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最热的词汇，就如何应对新常态，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在进行思想碰撞的同时不约而同给出了答案：创新。



创新只是药方,阵痛无可避免

知名经济学者、同时也是诺奖峰会组委会及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邱晓华对峰会主题“涅槃”二字做了重点解读。

邱晓华说，凤凰涅槃，是美丽的凤凰为了获取更美丽的未来，宁愿忍着巨大的痛苦，把自己身上美丽的羽毛尽数拔去，在浴火中获得新生。如今中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如何获得新生，正是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

“前段时间我去拔牙，我觉得拔牙和结构调整很相似。我一坐在牙科的躺椅上就高血压，害怕。在这个结构的阵痛期，千万别把企业弄成高血压，要先稳住它。然后呢，拔牙的时候，也就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要先打麻药，别不打麻药就动手，直接把企业疼晕过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将涅槃过程中的阵痛生动地形容为拔牙，引起现场嘉宾的一阵喝彩。

除了精辟的解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还分享了对未来的思考和期待。他说新常态持续的时间可能是 5 到 10 年。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决定 21 世纪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关键时期。

“新旧常态的转折期，至少需要 3 年时间。这段时间，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峰会嘉宾关注 自贸区建设与海西发展

去年 12 月，福建自贸试验区正式获批，福建经济也被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自贸试验区将给福建带来什么？企业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福建自贸试验区未来将如何发展？

1 月 10 日下午两点，本届峰会特设的专题论坛“聚焦自贸区建设和海西发展”正式启幕。

这是国内首次在高规格学术论坛上有针对性性地研究福建自贸试验区，包括吴敬琏、邱晓华等知名经济学者均在论坛上阐述了对自贸区的看法和建议，为自贸区建设和福建经济转型提供“智库”支持。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提醒，福建在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已取得的经验时，要避免“自贸区是类似过去的开发区、保税区等”的看法。

“将自贸区看作是特殊的政策优惠，是一种误解。建立自贸区的意义，其实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营造一个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吴敬琏指出，这是一个符合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提升、大趋势，这个开放的新动向，不单单涉及到对外经济关系，而是“像历来的改革所做的那样，以进一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

以负面清单制度为例，吴敬琏对此作出相应解释。他说，负面清单原本是在对外经济关

系谈判中面对的问题，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国内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在改革上跨出很大的一步，也意味着中国确认“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企业家要认清这一形势，提高自己对于贸易投资新规则的适应能力。

邱晓华则指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与发展，意味着中国将发生角色转变。“过去我们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是‘参与者’，现在我们将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请进来的同时也走出去。”邱晓华说。在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步伐下，资源将实现全球化配置，生产和销售也将进一步全球化，中国要走出去，适应新形势，就要主动制定自己的“新规则”。

中央已确定对台是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最大特色，峰会还特别邀请了海峡对岸的商界领袖对自贸试验区提出了他们的期待。

“商业总会在台湾有 140 万的会员，2400 个工会，我们非常期待透过海西，透过我们自贸区，未来规划发展，我们商业总会也即将更加积极的带领着台湾的企业一起到我们福建来投资来发展。”台湾乡林建设集团董事长、台湾商业总会第九届理事长赖正谔说。

诺奖峰会助力中国发展 助力福州发展

历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均备受瞩目。

并得到许多政策性补贴。对于药品企业来说，由于药品价格由政府定，拿到专利后可以把所生产的仿制药当成“新药”从而可获得更高的定价。一些地方政府还对企业申请专利提供现金补助。对于企业、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个人来说，有专利意味着为晋升加分、得到现金奖励，甚至进入某种“人才计划”长期得到不菲回报。

可以说，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是推动数量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也有很小部分企业忽略这些政府激励而与国际市场接轨，它们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例如华为。经过多年的耕耘，华为已经积累了大量国际国内专利，这些知识产权为华为与其他通讯巨头进行专利交叉授权贡献很大，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像华为这样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巨头的科技企业，也还未能在任何技术方面形成垄断，也没见他们主动起诉其他人侵权。也就是说，他们还远未达到专利质量的最高境界，只是把专利当成防御性工具而已。

那么，数量的增长是不是必然导致质量的提升呢？陈先生认为如果专利数量成长是市场力量推动的，那么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如果是由非市场力量来推动，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扭曲，除了浪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资金，对中国创新环境还会造成实质损害，因为社会可能会陶醉于数字达到世界第一的喜悦而失去前进的动力。更有害的是，很多有才华的科研人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低质专利和论文之中，而失去了进行重大创新的机会，而那些因为投机取巧从事低质知识产权的生产者的“成功”又会误导下一代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不追求重大创新而去创造一些让领导高兴、让自己获小利的低质量“专利”和“论文”的歧途。

从比较的对象来说，采用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概念，进而把中国分到“发展中国家”组，于是轻松得到“小组冠军”的称号可以让中国感觉很有正能量。但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些省市无论是人均GDP、或经济总量和人口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因此再拿“发展中国家”说事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回顾历史跨度的科技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一直在生存温饱

首届峰会探讨“未来经济十年模式与变革”，第二届主题“变革与创新，转型与风险”均产生了空前影响。原因无他，探讨问题重大、与现实关联紧密，嘉宾观点深刻。

为期两天的第三届诺奖峰会，在福州掀起一股经济学思潮。当这些思想分散全球，落地生根，或许会对未来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在本届峰会现场，福州市长杨益民也专程向峰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提出了自己的期许。

他指出，当前，福州发展正面临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展和福州新区开放开发、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建设、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特别是最近国家批准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福州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作为中国经济学界高端学术论坛，本届峰会深入探讨中国及世界经济变革大趋势，为各位带来一场关于经济与发展的“思想盛宴”。

“希望峰会进一步汇聚精英智慧，更好地助力中国发展，助力福州发展。希望各位嘉宾加强与福州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福州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联系点、创新创造的重要平台，与福州建立长期紧密的交流合作。”杨益民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峰会上，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会长、新华都实业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陈发树宣布，追加捐赠 2 亿元给闽江学院，用以进一步打造新华都商学院。“这笔款项，主要用于新华都商学院教学楼建设、学院教师工资发放及学生学费支付等。”新华都相关高层说。

公开报道显示，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是由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公立性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伊始，该学院便聘请 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担任院长。

为了让新华都商学院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11 日的峰会特意移师新华都商学院，邀请了大批学者与企业界继续就重塑中国制造等热点话题展开对话。

这一系列举动，无疑让新华都商学院、峰会、福州三者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让下一届峰会更值得期待。（袁健）

线上挣扎，但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最伟大头脑脱颖而出，为人类留下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可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完全有经济能力养得起一批专门从事科研的专才。事实上，科技发展一般超前经济发展，因此就因果关系来说，科技往往是“因”而经济是“果”。

在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国家，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更像是 在重复日本的发展路径。日本是一个乐于学习也善于学习的国家。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期的科技创新也蓬勃发展，其主要动作是快速吸纳欧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就，早期也是大量模仿他人的产品，后来有了一些科技的创新和管理创新，至今为止有十九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出现了像索尼这样被乔布斯当成功榜样的技术创新公司。二十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成功经验和日本引领全球的言论充斥媒体。然而正当欧美社会对日本的迅速崛起惊奇不安的时候，这一曲高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美妙音乐慢下来了。这个过程和结果有什么值得中国慢学的东西？

就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创新型经济”这个问题来说，用载入史册的科技重大创新来衡量也许更具有历史理性。我和学生们构建了一个“人类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成就数据库”，每一个条目都必须是公认的人类首创。目前该数据库收录了 2795 个条目，其中技术成就 1724 条，科学 1071 条，包括了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就。数据库里最近的一条中国技术是杂交水稻，这项成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丁颖先生开始，经过很多农学专家的改善，最后由袁隆平先生的团队推向广袤的农田，踏踏实实地造福了人类。我们收录的最近一条中国大陆发现的科学成就是明朝朱载堉先生于 1580 年发现的“十二平均律”，这项成就未必有大量的商业价值，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种没有功利之心的科研实在太少了。

因此，如果把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标准定为大陆本土科学家拿到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并且有大陆本土的企业做出一个引领世界并能记入人类史册的新产品，这对于一个经济总量世界数一数二、占世界人口 20% 的大国来说，要求不算高吧？